

红色出版家李达与笔耕堂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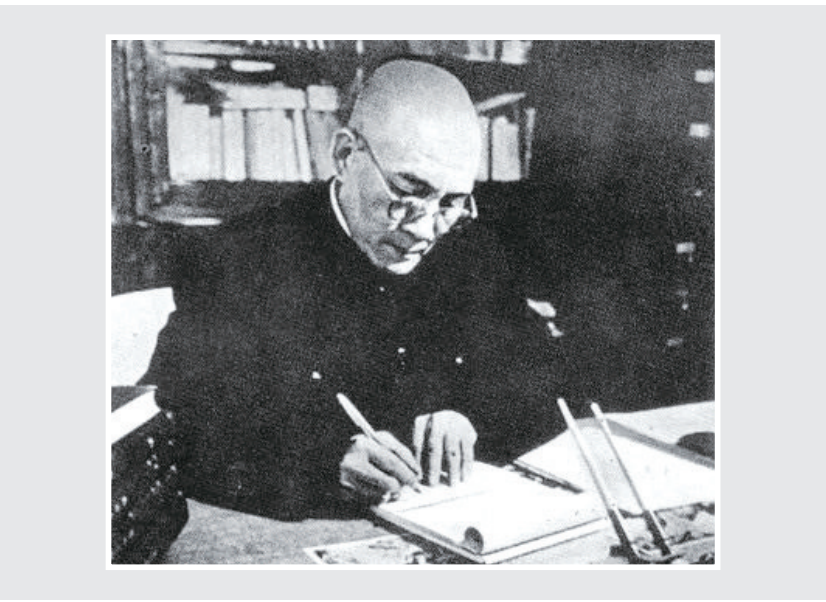
□ 李 荟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文献中心保存了一批署名为“笔耕堂书店”的红色文献。笔耕堂书店创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坚持出版系列图书7年之久，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红色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笔耕堂书店的创办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

五四运动后，李达便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早在1920年11月，李达就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刊物《共产党》的主笔，用纸笔积极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党的一大召开后，他积极投身红色出版事业，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播火者”。1921年9月1日，中共中央局在上海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的运营便由时任中央局宣传部主任的李达负责。短短一年间，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15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图书。李达在其中厥功甚伟，可谓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开拓者。

1923年，李达因种种原因离开党组织，但其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动摇，他始终坚持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创办笔耕堂书店之前，就进行过创办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图书的一些探索。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相关研究成果难以公开出版，已出版的图书也多在查禁之列。李达本人也因“宣传赤化甚力”被反动军阀通缉。但他不畏艰险，发起创办了昆仑书店，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昆仑书店先后出版了20余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国内第一部《资本论》中译本，以及《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这些著作的出版对革命事业可谓莫大的支持，但昆仑书店很快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眼中钉。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租界当局以新闻检查为由禁止昆仑书店发行新书。翌年，昆仑书店被租界巡捕房查封。

昆仑书店遭此劫难，李达却愈挫愈勇。昆仑书店被查封后不久，李达以王会悟的化名“王啸鸥”的名义在



上海英租界登记创办了笔耕堂书店。相比昆仑书店和此前的人民出版社，笔耕堂书店只有李达和王会悟二人支撑，既缺乏经费，也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稿源和发行渠道更无从谈起。出版条件和环境越来越恶劣。尽管如此，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图书，编辑、购买纸张等工作均亲自上阵。王会悟则分头跑印刷和发行。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确定为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图书共6种，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程》《反杜林论》《黑格尔与辩证法》《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辞典》《社会学大纲》等。图书出版数量虽远不及同时期其他出版社，但在当时极端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殊为不易。

囿于规模和经营状况所限，笔耕堂书店不可能大量出版图书，但目前所见笔耕堂书店版图书均选题科学、质量上乘，部分图书还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它们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广泛欢迎。其中，《社会学大纲》于1937年5月出版后，又于同年6月、1938年5月、1939年4月三次再版；《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更是再版五次之多。从选题和类型上看，这些图书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李达本人的讲稿及译著。1932年，李达来到北平，先后任北平大学、中国大学教授，留下了大量讲稿，但因他受到国民党当局防范和监视，想公开出版这些讲稿已不可能。因此，笔耕堂书店就成为李达“自产自销”的一个平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该书根据李达在北平大学任教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后，李达托王会悟冒着巨大风险寄给了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书高度欣赏，通读了不下十遍，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和读书笔记，并向延安的干部推荐，称其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二是翻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印吴亮平译《反杜林论》，该译本此前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吴亮平1930年被捕入狱，该书成为禁书。笔耕堂书店针锋相对，于1932年7月翻印出版了该译本，可见李达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和魄力。

三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如被毛泽东誉为“人民的哲学家”的沈志远从苏联回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

笔耕堂书店版《黑格尔与辩证法》，全面系统阐述了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区别。此外，笔耕堂书店还曾计划出版《中国现代经济概论》《哲学小辞典》《（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经济学大纲》《货币学大纲》《世界史大纲》等图书，但因种种原因，目前未见存世。由于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笔耕堂书店于1939年7月前后停止了出版活动。

在极其危险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笔耕堂书店在运行的7年时间里，出版工作始终处于地下隐蔽状态：书店在上海英租界用化名注册登记，从没有公开真实且固定的地址，图书内容也都经过精心“包装”。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外，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一般都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等名称，而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中性的学科名称加以掩饰，躲过了敌人的检查。

中共党史文献中心目前典藏笔耕堂书店出版的图书共3种7册，其中包括：恩格斯著《反杜林论》，沈志远著《新哲学辞典》，苏联学者奥斯特罗维采诺夫、拉比杜斯著《政治经济学教程》（上、下册）等。这些图书的出版时间集中在1932—1933年，主要为笔耕堂书店早期出版图书。其中，沈志远的《新哲学辞典》是中国人编译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辞典，成为大量青年自修马克思主义的工具书。

笔耕堂书店是红色出版事业的组成部分。李达夫妇作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不畏强暴传播马克思主义，用纸笔和印刷机有力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在白色恐怖下给予同情和向往革命的广大读者以巨大的鼓舞。笔耕堂书店出版的现存书籍也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红色文献



□ 刘 波

提起喝茶，多数人会联想到休闲、禅意、养生等茶韵雅事。如江浙的绿茶、云南的普洱茶、潮汕的工夫茶等，每一种都充满了文化韵味。而在我的老家也有一种曲米茶，却无关乎茶道和风雅。因为曲米茶名字叫茶但不是茶，里面没有一片茶叶，它是大米做成的，是夏秋时节用来解渴的汤食。

曲米茶的做法很简单，先将大米炒成深黄色，放凉备用。想吃的时候，锅中放入适量炒好的大米和大量清水，大火煮沸。待米煮到微微开花时，熄掉柴火，盖上锅盖，用余温焖上那么一小会儿，一锅好吃又解暑的曲米茶就做好了。

煮好的曲米茶层次分明，上面的茶汤清亮，闻起来有点淡淡的焦香；下面的米粒胀开，如朵朵绽放的黄色小花。刚入嘴有点若有若无的苦，咽下后又有微微的回甘，这大概就是曲米茶名称的由来。因为它的成分毕竟近于米汤，所以我老家的人习惯上说“吃”曲米茶，而不用“喝”这个动词。

我的家乡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平原，是棉粮主产区。夏秋两季天气炎热、暑气逼人，割小麦、种大豆、摘棉花等众多农活却又集中在这个时候。碰到抢收作物，经常忙得顾不上做饭，简单易做又解暑的曲米茶就派上了大用场。一天劳作下来，腹空头胀，十分厌食，这时吃上一大碗清凉

的曲米茶，再配上馒头和腌制好的黄瓜、蚕豆、雪里蕻，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满身的疲惫和饥渴一扫而空。

儿时的我在农村长大，爱吃曲米茶，也学会了做曲米茶。农家做饭都是就地取材，麦秆和棉梗就是常用的柴火，它们好烧但不耐烧，往往需要一个人专门看着灶火。有一次奶奶炒曲米茶（将大米炒熟），我坐在灶台前时不时地往灶里添加麦秆，看着她轻松地翻动锅铲，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事儿，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我搬了个板凳放到灶台边，站了上去，按照奶奶教的方法，将锅铲顺着锅边快速铲下去，再慢慢地挑起，不断翻动锅里的大米。新鲜劲儿过去，我的胳膊越来越酸，锅铲越来越重，额头开始出汗，动作也越来越慢。这时的大米只是微微发黄，奶奶减小了灶火，跟我说再坚持会儿，马上就要炒好了。一声声鼓励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锅里的大米终于炒成了深黄色。满头大汗的我放下沉重的锅铲，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很有成就感，同时也明白原来炒曲米茶也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从那个夏天开始，家里也能吃到我炒的曲米茶了。

家乡的农活离不开曲米茶。记得有年端午节前后，学校放假，让孩子们回家帮忙收冬小麦。天刚蒙蒙亮，家里就煮好了够吃一天的曲米茶。虽然没到盛夏，太阳的威力也不容小

觑，再加上尖锐的麦芒可以轻易划伤皮肤，即便是大热的天，也必须戴上草帽，穿好长袖长裤，全副武装。大人们干着最重的活，用镰刀割麦秆，打成捆。镰刀太过锋利，孩子是不能碰的，我只能穿着厚厚的鞋子，在新割的麦茬间，寻找遗漏的麦子，收集起来放入未打捆的麦堆。太阳很快升上头顶，气温也随之升高。人们干着手里的活，呼吸到嘴里的空气像着了火一样，汗水顺着草帽下的脸庞一直往下滴。忙乎一上午，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带来的茶水也已经喝完，大家又饿又累，直不起腰。

麦田离家很远，小麦还有很多没割完，大人们在麦田边休息，我和哥哥回家取午饭。哥哥将放凉的曲米茶倒入一个大桶，另一个大桶装上茶水，满满当当的。茶水也用来解渴，但曲米茶还有祛暑清凉、补充能量的作用。哥哥用扁担把两个大桶挑在肩上，走在前面。我拎着装满馒头、咸菜、碗筷的篮子，紧紧地跟在后面。田间的小路崎岖不平，长长的扁担随着哥哥的步伐上下颠簸，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轻轻摇晃下，桶里的茶汤略有溢出，沿着桶壁流下，和他脸上的汗水一起滴入脚下的土地。

回到田间，我倒好一碗碗曲米茶依次送到各人手中。大家一边大口吃着清凉的曲米茶，一边高声谈论今年的收成和近日的农活安排，满是汗迹

的脸上难掩兴奋与喜悦。

作为吃曲米茶长大的孩子，曲米茶留给我太多美好的记忆。时光流逝，我从农村的小学，升到初中的初中、城里的高中，最后上大学离开了家乡。和家人一起收割麦子的日子渐行渐远，喝曲米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后来，我在北方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每到夏天，我也做家乡的曲米茶。孩子刚开始不爱吃，嫌弄有点苦味，我就给她讲儿时学做曲米茶的趣事、全家一起劳动的辛苦和收获的快乐，和她一起做曲米茶。慢慢地，她也喜欢上这道吃食，曲米茶成了我家夏天必不可少的解暑佳肴。

不管什么时候，家乡的曲米茶总是那熟悉的味道，刚开始是淡淡的苦，仿佛在诉说劳动的不易，细细品味，就会尝到辛勤付出后的甘甜。它告诉我们，幸福不会从天而降，只有通过勤劳的双手，才能创造出向往的美好生活。



1931年我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一个雇农家庭。七七事变后，铜山既是日军经常“扫荡”的地区，也是国民党七路军、土匪和帮会活动的地区，百姓生活极不安定。

1942年，我大哥和二哥先后去了山东省单县解放区。大哥参加革命工作，二哥在学校学习，家中就剩下父母和我。

1943年我和父母逃荒，先后到过铜山县的牛庙村、李庄村。最后到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千里井村，那是我姐姐的婆家，我们在姐姐家生活了3个月。

有一天，突然接到我大哥的来信，要我们去山东省单县解放区。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带，推着手推车就去了单县的江庄村。到那里时已是1944年的春天，我13岁，渴望上学读书，就去了村里的抗日小学就读。那时的读书环境非常艰苦并且危险，因日本鬼子经常“扫荡”，有时就要把书埋到地里，女生还得假装缠上脚，不然就会被鬼子当成八路军抓走。在校两年，我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又从三年级跳到了五年级。

1946年暑假，我和同班的三位同学一起去山东省金乡县湖西中学，看望我哥哥和同学的姐姐及姑姑。这所中学实际上是冀鲁豫边区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当时正赶上湖西中学招生，学校同意我们参加考试，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1946年9月入学，这就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15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入学没几天，国民党军队进攻单县解放区。从此，学校开始了游击生活，从金乡县撤到了山西运城。此时战争形势十分危急，我们跟随区党委两渡黄河，辗转到了山东省阳谷县宁仓村。学校让我们参加土改，大家没有经验，就请了冀鲁豫报社的记者姚力文来作报告，恰好他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会后，校长和教导主任把我们叫到办公室，让我们谈对象。当时我认为自己年龄还小，谈恋爱为时尚早。姚力文表示他可以等，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1948年春天，学校又回到了金乡县，这时就宣布我们毕业了，分配我到区党委党校去学习，实际上是培养南下干部。就在这个时候，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北上，因为姚力文已调至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冀鲁豫日报社工作。但当时菏泽到石家庄没有火车，我在菏泽等了四五天，正好遇到一辆到石家庄拉货的卡车，我便搭车到了石家庄。

这时冀鲁豫日报社已搬到了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我在石家庄找到了报社的办事处，打电话让姚力文来接我。等了3天，他没来，我就背着背包往冀鲁豫日报社所在的西北方向走，刚走了十多里路，就碰上了姚力文。我俩一起翻山越岭回报社，下午4点多终于赶到了。一见面，报社社长就动员我们结婚，于是我俩当天就结婚了。

1948年11月，姚力文调到人民日报社（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编辑部。这时已近年底，一个星期后姚力文就要去太行山采访，报社派一位通讯员牵来一匹马，把我送到石家庄财经学院，我在这所学校学习了6个月。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5月，我从石家庄财经学院结业后来到北平，住在华北局招待所。后被分配到北平市第八区工作，先到工会，后到区委宣传

通向光明的求学之路

□ 牛甲英

部。当时的同事大多是大学生或高中生，他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这使得我的压力很大。这时中国人民大学在东城区张自忠路办了夜校，单位派我去学习中国历史、联共（布）党史，从夜校学习回来就给第八区的工人、店员讲历史，讲联共（布）党史。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发表了重要谈话，论述了青年学习和健康的重要性，寄语青年要学习好、身体好、工作好，又唤起了我学习深造的念头。经北京市委组织部批准，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并担任班里支部委员。4年学完了初中、高中的课程，并被评为优等生。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出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是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第一声春雷，激发了我进一步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愿望。1957年我被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大学期间担任党史系二班党支部书记。1958年5月，姚力文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后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1961年毕业之时，我被选调到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工作，在党建教研室做资料工作。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后，我承担教学任务，下班讲课。

我从13岁上抗日小学直到1961年调到中央党校，都是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学习、进步、工作的。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全家，使我走上了求学、进步这条通向光明之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丰富和有意义的一生。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